

“跨越国境的历史”与东亚

从日韩思想史的视域思考

桂岛宣弘

一、前言 何谓跨越国境的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喧嚣多时。的确，于瞬息之间将全世界的情报手到擒来的时代已然来临，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等途径，轻而易举地取得地球上众多区域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情报。但是整理和理解这些情报的“量标”自身（即使后国族主义 post-nationalism 相关的重要理论已有变化的征兆）依然是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我们无法脱离以民族（归属的国籍）或国民语言等单位来观察、思考世界的窠臼。犹有甚者，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在对地球史＝整体史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退潮的同时，所谓世界的全球化理解终究无法超越进行国民文化比较的框架；而且国民文化比较论归根结底，是通过“差异的确认”，以强化本质还原论的观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将历史“开放”至全球，我现在最关注的是韩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尹海东所提倡的“跨越国境的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这个概念。若论起 transnational history，这里的 trans 是一个包含 across（横跨）、beyond（超越）、through（贯通）等意思的前缀，transnational 这个用语包括了“横跨国家的、超越国家的、贯通国家的等涵义”。因此，所谓的 transnational history，可以说是“横跨国家的、超越国家的、贯通国家”的历史。现摘引尹氏的说明如下：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世界体制的历史，一直以来都仅以一国为单位作为前提来理解，这正是近代历史学的重要属性。但是，只要不具备有能够超越国家、跨越国家之间的视野，就不能正确地掌握人类的历史。“跨越国境的历史”的尝试正是为了这样的需要。要言之，所谓“跨越国境的历史”是为了超越一国史、而作为一国史的代表者而提出的概念。（中略）这样的概念包含着下面几个问题意识：第一，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第二，提出周边相对于中心的问题；第三，超越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二分法观点；第四，对地域史（regional history）之封闭性心存忧虑。可以说“跨越国境的历史”是超越近代历史学基础的一国史，

本文是将题为《所谓跨越国境的历史的视角》，发表于《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77号（京都民科歴史部會，2010年）的文章，將中国納入射程之中、大幅改写而成。文中所使用的史料等全部译为现代日語。

而同时含括了以下的问题意识，亦即克服欧洲中心主义、以周边和弱势为中心，从包含全球的层次来重新理解历史。并且，藉由将人类中心的历史相对化，而强化生态史方面，从在这一点上也应该高度评价“跨越国境的历史”的意义。

历史学上如何具体实践这个理论，困难性我们暂且不论。有关这个概念尹氏已做了明白的说明，没有必要再作补充。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trans 的意思当中 through（贯通）=“互换性”，“共时性”的这个部份。也就是说，藉此可以回避经常附着在“全球史”或“世界史”等概念上之的“国民史总合”的误解（即使其原本的意图不在此）。此外，虽然今日之世界分成各式各样的国民国家，但作为一个概念，从过往曾经共同拥有的共时性结构来处理帝国=领域的历史、掌握至近代为止的互换性历史结构，对此“跨越国境的历史”是个极其有效的概念。如后所介绍的，具体而言尹氏提出这个概念是作为一种掌握帝国日本殖民地统治时代的视角（而且，这在曾经同为帝国日本侵略的中国也是具有启发性的），尹氏所提出的问题当然不限于近现代史。事实上，在韩国已有近世史研究从这个“跨越国境的”观点着手进行新的东亚研究。例如：有关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近年在韩国已出现与此前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必说，以往在韩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文禄、庆长之役）被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倭乱”，将其视为日本国（或者是日本人）在帝国日本侵略前的一个试探，证明其历史性的暴力性（野蛮性）。也就是说，在韩国这个史实，不是作为过去遥远的事件，而是将其与近代日本连结起来思考，这种看法长期以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就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说是较殖民地统治的问题，日韩之间认识差异更大的事件）。但是，鄭杜熙、李璟珣等“东亚战争史研究会”的成员却将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称为“壬辰战争”，将其定位在如十六世纪末东亚的动乱、女真族（之后的满洲族）的崛起所代表的东亚秩序大动乱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翰奎的研究，金氏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传统国家消灭为止，十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由出现在辽

以上引自尹海東：《跨越国境历史的可能性》（《季刊日本思想史》76 號，ペリかん社，2010 年，裴貴得译）。尹海東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作为后述殖民地近代性论的论客，不仅在韩国，在日本也很知名。主要著作有《殖民地的灰色地带》（首尔：历史批评社，2003 年）、《殖民地近代的悖论》（首尔：humanist，2007 年）等。另外，严格来说，“跨越国境的历史”的概念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于韩国《transtoria》《trans间》等杂志刊行后开始受到瞩目的概念，并不是尹海東的独创。（再往上追溯的话，可以说是 1990 年代欧美人文学界的「越境史」「越国史」等下层（subaltern）研究的影响开始及于韩国的历史研究中所出现的概念，在此不再深究。）

东的一连串统一国家主导了东亚世界的秩序”，明代的辽东发生了“权力的空白状态”，这正是导致女真族和丰臣秀吉等入侵的背景。无可讳言，这是不将丰臣秀吉的侵略仅当作关系日韩两国间的事件，而是视为“超越国家的界线、在东亚的国际舞台上重新省察”之跨越国境的研究的正式登场。

由此可见，“跨越国境的历史”主要是由以往民族主义历史学占有压倒性影响力的韩国发端，这是什么缘故？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个人较为关注的，是1990年代后半以降，从后殖民问题相关的讨论为引子，提出的不再停留于日韩两国间关系的观点，以及围绕这点引起的激烈论争。亦即以后现代主义研究、年鉴学派历史学为首的新兴历史方法论在1990年代以后，于韩国格外显著，特别是有关“殖民地近代”，“近代性”等不限于日韩两国关系的问题接二连三地被提出，这个动向剧烈地改变了韩国历史学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动向，我们该如何应对？“从国民史到跨越国境的历史”这个课题必须突破理论性的工作，与实践性的课题联结起来才真正具有意义。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于韩国（朝鲜）的人们、还有中国、东亚的人们，以历史学（思想史学）为媒介、发展共同的研究活动，向跨越国境的历史的转换是紧要且必至的课题。这一点必须铭记于心。

二、跳脱「锁国」日本像与近世帝国论

（近现代史当然不用说）在古代史、中世史研究上，此前已进行过多次将日本史“开放”至东亚的尝试。就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阻碍是立足于“锁国”像的日本近世史研究（以下，基于与韩国、中国学界讨论的实际情况，称为“德川日本”）这个领域。但是，众所周知，透过朝尾直弘、荒野泰典、藤田觉、Ronald P. Toby、池内敏等人在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上的进展，1990年代以后德川日本的“锁国”像理解终于已逐渐被打破。当然，关于这一点，例如“锁国”

以上引自郑杜熙、李璟珣编《壬申战争》（金文字监译，小幡伦裕译，明石书店，2008年）。金翰奎執筆第十章《壬辰倭乱の国際的環境》。此外，這樣的研究後面，也存在著中韩之间围绕着高句丽和辽东的极为政治性的历史认识问题，不能毫无顾忌地给予肯定的评价。在此附带说明一下。

韩国之历史研究的剧烈变动、特别是关于殖民地时期朝鲜史研究，参见庵途由香《关于殖民地时期朝鲜史像をめぐって》（《歴史學研究》868號，2010年）。

作为这种工作的一种尝试，立命馆大学与韩国高丽大学校日本研究中心之间，进行了重新检讨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史》之共同研究。其成果已刊载于包含尹海东文在内的《季刊日本思想史》76号的专刊号（《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歴史編纂》）中，请参考。

当然，我是个门外汉，不过在中世史方面可以举网野善彦、田中健夫、村井章介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另外，1990年代的《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系列（～，東大出版會）和《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系列（1～7，東大出版會），在开拓共同掌握亚洲史和日本史的观点这方面，可说是划时代的研究。

例如：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大出版會，1988年）、Ronald P. Toby《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創文社，1990年）、《朝尾直弘著作集5》（岩波書店，2004年）、藤田覺《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關係》（東大出版會，2005）、池内敏《大君外交と「武威」》（名古屋大出版

已被证明是志筑忠雄于 1801 年摘译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的《日本志》时所使用的概念。也就是仅将其理解为一个轶闻，或者是德川幕府在十八世纪以后所使用的“海禁”的另一种说法。总之以“锁国”的印象来理解“海禁”，这样的理解倾向今日依旧强烈。但是坦率地讲，以“锁国”像来掌握德川日本的问题性，不外乎是在“近代世界体系”、“世界=经济”（不用说正是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概念）的概念下、用来自欧洲的日本像来理解德川日本。换言之，关键在于：以近代日本的脱亚式的眼光来看待德川日本，将导致存在于中华帝国的周边、外缘的德川日本当时的国际性退居为背景，结果完全在与荷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的关系当中去论述“封闭的”德川日本的一国性、孤立性。

而且，这种理解方式之所以在学界自然地固定下来，明显地与此前的近代国史学（国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简言之，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国史学的建立是受到经验科学之德国文献学的影响，将文献学=近代实证主义这看似“无思想”的方法（正确来讲应该是战后的历史学）采用为研究方法的这个时期，同时以国民史（民族史）、基于社会进化论发展史观的时代区分、西洋中心史观（Orientalism）、以及政治史事件为中心，“走私”了记述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的模式，这些使德川日本的“锁国”像成为决定性的图像。在此无法细述，总而言之，确立作为一国思想史学之日本思想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和辻哲郎，他的《锁国》一书长期以来立于定说的位置，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能说是偶然。

总之，近年所见的跳脱“锁国”日本像的动向，在将这近代国史学之脱亚的历史像予以相对化、反题（fürsich）化方面、以及前述的重新思考跨越国境的德川日本方面，都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思考跳脱“锁国”日本像方面，我认为另一个有效的提议是山下范久的近世帝国论。山下批判沃勒斯坦假说之“世界

会，2006 年）、Ronald P. Toby 《「锁国」という外交》（小学馆，2008 年）等。

关于兰克（Leopold von Ranke）、李斯（Ludwig Riess）等德国近代历史学的传入日本，小岛亮《歴史学の終焉 制度的歴史学の崩壊によせて》（《Chubu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orum Series 80》（中部大学中部高等学术研究所，2010 年）一文，在德国哲学（黑格尔、黑格尔左派、经验论等）的关联下对此有非常清楚的整理。当然，小岛氏对于德国近代实证主义的传入日本这个通说性的理解，提出双重、三重意义的疑问，认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拙作《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有志舎，2008 年）。

“帝国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近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长期的十六世纪”以后的展开）无疑是单线的西洋中心史观，而在“长期的十六世纪”后半期以后设定了世界性的近世帝国（欧洲、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清帝国）的时代。简言之，在经过十三至十五世纪全球规模之帝国的收缩、解体之后，十六世纪的前半期、开始走向一般视为“大航海时代”之空间扩大的时代。然后，应该在十六世纪后半期插入管理和制度化的阶段、亦即“世界=帝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间过渡阶段”。此时，“帝国在各地域发挥空间秩序凝聚的向心力，而平行地形成理念式的世界。”换言之，共有着，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理念式的“帝国”的向心力的同时，各地域内为争夺向心力之普及的在地性也宣告登场，这确立了帝国的、在地的，双重准则，这就是近世帝国。山下做了如下的说明：“在‘长期的十六世纪’的后半期，交通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整理和秩序化，在共有抽象层次的‘中华’理念的同时，在实体的程度上，作为地域普遍性的中心、各自追求向心力的诸王朝间所建立的相互依存的（乃至共谋的）紧张关系，使其产生将交通封闭于域内的倾向。”

附带说明，山下的假说是建立在 1800 年前后近世帝国体制的“全球性（globality）的中断”发生之后，世界变为“帝国不在”之国民国家的，这个前提下的。同时他将当下的“帝国化”（Toni Negri 与 Michael Hardt）也纳入了射程，关于全球化，他认为「全球性的中断」这是世界史上殊为例外的事态。这么说的话，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国民国家体制（世界分割统治为 150 个以上的国民国家的世界体制）也是一个例外的事态。“全球性的中断”目前告一段落，而开始呈现某种变化。如果将沃勒斯坦的帝国概念置换为共有某种论述式之“普遍性”的空间，将主要共有国民国家式之“封闭的”理念的近代世界体制视为例外的事态，并且进一步将现代世界视为朝着共有“开放”的“普遍性”迈进的路程的话，那么这个观点在展望跨越国境的历史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

山下的近世帝国论与现在近世东亚史研究的主张大致吻合。例如：岸本美绪将十六世纪前后的变动期至十七、十八世纪视为“全世界来看同样具有几大特征

《世界システム論で読む日本》（講談社メチ工，2003 年），頁 124。

同上，第四章。

Toni Negri、Michael Hardt（水嶋一宪等译）《帝国》（以文社，2003 年。原著刊於 2000 年）。关于此书与沃勒斯坦的议论，参见山下范久编《帝國論》（講談社メチ工，2006 年）。

的时期”，并且依据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的说法提出以下几个共时性的特征：“（1）人口的增加、（2）历史性节奏的加速化、（3）作为经济活动中心之「地方」都市的成长、（4）都市商业阶层的兴起、（5）宗教的再兴与传教活动、（6）农村的骚动、（7）游牧民族的没落。”而且，她将这个时代视为“创造出与今日联系之国家的地理、民族框架”的关键时期，“各国具有特征之制度和习惯的成立，即使与近代国家主义不同形式，仍伴随着与他国对比之自我意识的强化”，在与“华夷观的多元化”互相交错的同时，形成作为之后近代克服对象之「传统社会」的时代。关于德川日本，岸本氏亦将其统一政权的成立视为“与多文化状况引发的危机感互为表里而进行的结果”，提出须与东亚至东南亚之广域范围的动态共时性地掌握的视角。就我来看，岸本氏的说法正与山下所说的近世帝国概念不谋而合，两者在思考跨越国境的历史这点上都是富有刺激的观点。

再者，德川思想史（或者明清思想史、朝鲜思想史）的世界在鲜明且理念地揭示这近世帝国之共时世界性这一点上，值得重新再加以检讨。当然，在处理理念的思想世界时，理念并不一定与事实同时发展，例如十五世纪为止之明代册封体制的兴盛如果说体现了事实上的明中华主义的话，其作为朱子学的理念而被接受，则必须说是在“东边”的德川日本、特别是十七世纪前半期。但是，其实在文本上阐述世界图像的思想家—知识人那里，可以更为显著地看出与前述的“锁国”像大异其趣的（跨越国境的）“生活的世界”，这一点应该更加留意才是。如此观之，我想说的是：在思考跨越国境的历史的可能性时，德川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立足点”。以下，我们就这一点再作简单的描述。

三、迈向跨越国境的（transnational）思想史

众所周知，在战后的德川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压倒性影响力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今天，对丸山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可以以一句话将丸山的研究归纳为：将伯克（Franz Borkenau）的所谓从中世自然法至近代性思维所揭示之近代性的展开过程，沿着德川思想史，内在地描绘出来。因此丸山的近代主义、以及他自我批判性的脱亚性是一目了然的。关于这一点，诚如姜尚中指出：“地缘政治学的论述显然是这样的双重操作：其一透过与‘西洋’之假想

以上，参见岸本美绪《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13》，岩波书店，1998年）。

东大出版会，1952年。原发表于1940年～1942年、1944年的《国家学会杂志》。

的中心的比较，来表述作为同构型的‘他者’的亚洲；另外也意味着，透过与其它亚洲国家做比较，将符合西洋秩序观念之日本国民文化的特质凸显出来。以上都势必为自我论式地强化日本的国民文化同一性之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填充了能量”子安宣邦指出：“丸山吸收了因公、私的区分，而获得的私的内面领域的自由、确立人为的国家观。在关于具有‘世界史式的课题’之‘近代’的叙事，将徂徕的‘解体’工作视为‘分解过程’；从而建立了‘思想史’的叙述”。笔者也曾经指出：丸山关于引用黑格尔的“持续的帝国”之中国观，乃至认为：“类似我们在欧洲的中世至近世的哲学史上的后期经院（Schola）哲学所扮演的角色”，“朱子学纯粹且全面地具备了共同小区（Gemeinschaft）式的思惟”等说法，完全地继承了井上哲次郎以来战前期日本思想史学之一国史的结构。

丸山主要关注的是德川日本思想史下的一国思想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必须承认朱子学的思惟是作为“儒教这原本承担实用性格的思想，所能拥有空前而恐怕也是绝后之大规模的理论体系”之共时性的东亚世界=近世帝国的思惟。也就是说，即便丸山的立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为讨论的前提所做的，东亚全域所共有的朱子学、儒学思惟这个设定本身，值得我们以今天的观点重新再加以探讨。

例如：丸山对朱子学的一般性理解是：“道学的合理主义、内含严格主义（rigorism）的自然主义、连续性思惟、静的=观照倾向”；而评论藤原惺窝是：“没有一步超出朱子学说的忠实介绍”。丸山仅将惺窝定位为东亚性思维的单纯“介绍者”，而我认为应该重新认识惺窝、并把惺窝看作是对明朝、朝鲜、安南的“文化力”、（近世帝国=中华世界之）共时性世界所寄予的强烈信念的人。具体而言，（都是非常有名的）惺窝以下的论述值得注意：

“世界之所以是一个世界，是因为共有着‘性’。以性来看，世界的差异仅是衣服言语之些微的歧异罢了。”（《致书安南国代人》）

“异域与日本虽风俗言语相异，天赋之‘理’皆同。”（《舟中规约》）

这里面，充满着惺窝对“性”、“天赋之理”的普遍性之无可动摇的确信。还

姜尚中<丸山真男における<国家理性>の問題>（《歴史學研究》701 號，1997 年）。

《「事件」としての徂徕学》（青土社，1990 年）。

前掲拙作《自他認識の思想史》。

《藤原惺窝集》上（思文阁出版，1978 年〔初刊是 1941 年〕，页 125，原汉文。

同上，页 126，原汉文。

有，他对因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遭俘虏来日的姜沆说：“我非生于中国、亦非朝鲜，而生于这终日陷于战乱的日本，真是何等可惜啊！”（《看羊录》），又有传说。他曾对弟子吐露心腹道：“唉！不生于中国、也不是生于日本古代，却是生于现代，真是多么遗憾啊！”（《罗山先生文集》）由此可知，惺窝受到他眼中那近世帝国的文化中心（中华）的中国、朝鲜强烈的吸引。相对地，姜沆对惺窝的高度赞赏也与与这一点有关。

就共时性这一点来说，有必要提一下姜沆。众所周知，姜沆是朝鲜王朝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期的著名朱子学者。曾师事畿湖学派（西人派）的重镇成浑，而畿湖学派众所周知乃是继承李珥（栗谷）的流派，在十六世纪后半与继承李滉（退溪）的岭南学派（东人派）互相对立。十六世纪前半的朝鲜王朝，士林成功掌握了王朝中枢，朱子学也确立了作为朝鲜王朝官方教学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导致朱子学的发展受限于关于现实政治路线的，日益激烈的党争。畿湖学派与岭南学派的对立即是其最初的例子。关于成浑，在学派内部，与李珥进行长达六年的理气论争（《四七理气论争》），相对于李珥“气发理乘”之主气的立场，他主张主理的立场。关于姜沆似乎多谈了些，不过德川王朝的知识人从“东边”接受的朱子学，并不仅止于闇斋学派与岭南学派，自惺窝与姜沆以来，对于当时期的知识人来说，是极为常识性地具有共时性的意识。

再者，所谓近世帝国，是在共有理念性的“帝国”向心力的同时，在域内出

《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 73 睡隐集》（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 年），页 120，原汉文。

《林罗山文集》，页 346，原汉文。

如同李泰镇所指出的（《朝鲜王朝社会与儒教》六反田豊译，法政大出版局，2000 年），将这些党争视为无意义的争论，并刻画出仿佛那就是朝鲜朱子学的特性、甚或朝鲜王朝的属性，不得不说殖民地时代日本方面的史观发挥很大的作用。李氏进一步厘清：士林派体现了与古代的贵族阶层针锋相对而成长的中小地主层的利害关系、并成功地掌握权力，显示朝鲜王朝已确立了近世的社会；在那里，确立了正统教学的朱子学=性理学，是肯定权力的偏颇、以道学的政治为目标的。在内部的形而上学的争论里面，确实是有所弊害，但是在基础上存在着围绕现实政治路线的分歧（在与门阀贵族阶层的关连上来说，最强烈主张排斥气的东人派南冥学是与门阀贵族处于互相对决的关系，中间夹着李滉，理通气局论的李珥、理气一发论的成浑则是现状妥协的），毋宁是互补的关系。在这里重要的是，将朝鲜朱子学的种种样态放在与近世社会的成立的关连上来掌握的这个观点。在地方社会上巩固经济基础的新兴势力，试图以共时性的理想来表现自己、并占有王朝的一翼，应该视为该时期东亚思想史最基本的动态。关于这一点，亦可参见前掲岸本《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

这个论争是直接继承了李滉和奇大升之间的《四端七情论争》，两者都是现在韩国作为历史知识最为人所知的论争。李滉认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在理气二元论上持主理派的立场。关于这些论争，详参裴宗镐《韩国儒学史》（川原秀城译，知泉书馆，2007 年）。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東大出版會，1965 年）。

现了争夺向心力的普遍性之在地性，而确立了双重准则的阶段（山下），与“华夷观的多元化”交错、形成“传统社会”的时代（岸本）；对于“华夷观的多元化”=在地性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无疑是历时百年动乱的明清王朝交替（华夷变态）。具体而言，在朝鲜王朝，因为1627年的丁卯胡乱、1636年的丙子胡乱，朝鲜小中华思想之自我意识几乎在整个十七世纪已超越学派、成为一般性的意识。例如：因1623年的仁祖反正而掌握政权的西人派老论系的代表性知识人宋时烈，他的北伐论即是这“华夷变态”后小中华思想的代表。他主张以继承明朝嫡统的小中华、礼仪之邦来讨伐清国的“春秋大义”。（《宋子大全》）在这里，中华的概念与地域无关，尤其是建立在箕子以来传统的朝鲜，在礼、文方面的中华这个意识，非常值得注意。还有，在认清现实上已难打败清国的十八世纪，这个朝鲜小中华思想更转向发展出视朝鲜为唯一中华的朝鲜中华主义。具体来说，这样的主张显著出现在同属西人派之少论系的金若行、李鍾徽身上等人。当然，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老论洛论系的北学论，虽是学派相异、在南人系和近畿南人系（实学系）里，也有清国肯定论、或者提倡西学研究，这些在野学者的观点也不容忽视。但是，尽管有迂回曲折，至少在朝鲜王朝的庙堂里持续造成重大影响的，仍是老论、少论系的朝鲜中华主义，特别是到了对西欧的危机意识渐趋明显的十九世纪，老论系的论述再度强化了起来。

这些朝鲜王朝的思想动向，乍看之下似乎是强调朝鲜中华主义之排他式的独特性，但那种独特性的强调的确是跨越国境地，它与德川思想史的转向处于一种共振的关系。在此无法详论，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华夷变态」，基于「自国=中国」论的日本型华夷思想由山崎闇斋、浅见綱斋等人提出，而对理念性、文化性的自他认识造成了微妙的变化。之后，到了十八世纪，衍生了垂加神道等主张的日本中华主义，加上对太宰春台《辨道书》的反驳，对徂徕流的“作为”提出异议，同时赞扬“自然”、“自然而然（おのづから）”的日本的论述开始遍地开花。我们必须说：荷田春满、贺茂真渊、乃至本居宣长国学式论述的出现，

《卷五封事》（首尔大国史学科编《韩国思想史资料选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2年），頁314-330，原漢文。

以上，参见河宇鳳《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井上厚史译，ペリかん社，2001年）、河宇鳳《朝鮮王朝時代の世界観と日本認識》（明石書店，2008年）。

谷泰山、佐佐木高成、迹部良显、伴部安崇、若林强斋等。

都与这样的思潮脱不了关系。从日朝相互的他者认识这个观点来看，这些朝鲜中华主义、日本中华主义等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既然视自己为中华、小中华，必然将强化视对方的日本、朝鲜较自己在文化上居于劣势的意识。众所周知，受到丰臣秀吉侵略的朝鲜方面可以看到很多如此看待日本的论述。另一方面，在此不可忽视的是，既然在根底存在着共时性的意识，（如同前述的姜沆一样）也就还存在对德川日本儒者的赞扬。例如：著作《黑齿列传》的许穆赞扬德川幕府求取儒书的事件是“蛮夷的盛事”，另外以著作《东史纲目》闻名的安鼎福也从儒学的言行方面赞扬了山崎闇斋学派和伊藤仁斋。在德川日本方面，在日本型华夷思想里也可看到将日本较朝鲜列于优越地位的论述。但是，在就如此认识的框架本身内，也有例如在雨森芳洲那里存在着不受“国境”、“人种”局限之共时性普遍主义的想法。担任与朝鲜人士“交邻”之任的芳洲曾指出：“为与朝鲜交流，知晓人情事势殊为紧要”，他特别留意“日本与朝鲜”之间具体的“诸事风仪”的差异。他还说：“丰臣家进行不当的朝鲜侵略，两国无数的人民遭到杀害，这绝对不是可以自傲的事，反而显示了我国的不学无识”，否定了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这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交邻提醒》）以上这些都是显示德川日本儒者在当时的稳健的朝鲜观之贵重史料，乍看之下，似乎存在很大的相互“蔑视”，但是如果是建立在近世帝国内的跨越国境的普遍主义之上的话，就可以说其中存在着与近代国家主义决不不同的，相互认识特质。

正如山下氏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留意，在近世帝国普遍性里，理念式的倾向浓厚，在实态上已有个别性开始成型。关于这一点尚未能言及于此，丸山真男的议论在此也有必要再重新检讨。亦即，丸山所谓的朱子学至徂徕学、国学的分裂过程，有必要将其视为“东边”的思惟构造的转变过程，把他当作东亚共时性中，发生的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来重新思考。清朝之儒教、朱子学的机能主义式的转向与考证学的成立、朝鲜之正统意识的转变等，虽有浓淡之别，但都可将其视为与德川日本的朱子学分解连动的近世帝国普遍性的分解过程。“全球性的中断”

拙作《思想史の19世紀》（ペリカン社，1999年）。

前掲《韩国思想史资料选集》，页332，原汉文。

《顺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国译顺庵集》三，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页15，原汉文。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11—3雨森芳洲全书三》（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9年），页53。

(山下)为这种同心圆式的近世帝国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共时性近代?这是与这个分解过程的地域性偏差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将是今后德川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结语 殖民地近代性论的追问

如开头所述,“跨越国境的历史”是尹海东所提倡的概念,这是有关韩国围绕殖民地近代和近代之剧烈变动而论争性地提出的概念。最后,我将谈一下与其变动相关的殖民地近代性论,以再次思考包含中国在内之跨越国境的历史的可能性。

在韩国,一直以来所谓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占据了压倒性影响力(虽然历史上的情况不同,在中国应该也一样)。如果考虑到战后韩国(和日韩关系、或者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经历了帝国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被剥夺了自己记述历史的权利的人来说,找回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其建构为一个民族史、国民史,是殊为紧要的课题。尤其,把殖民地时期日本方面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记述,视其为根据“他律性史观”、“停滞性史观”、“日鲜同祖论”的“殖民史学”,而对其严厉的批判。然后与之相对的,急欲建构自律的、发展史式的民族史。又加上,战后日本对殖民地统治的「过去清算」毫不彻底,甚至恼羞成怒似的发言不断在日本上演。由此推之,我们不得不说: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在告发帝国日本的犯罪、进而树立自律的国民国家已成为重要课题的阶段,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延续至今。(因此,国民史=一国史不应以一般论来批判。)

在这种民族主义历史学面前,提倡“跨越国境的历史”的尹海东等人提出了殖民地近代性论的议论,从正面对其进行了批判。一言以蔽之,尹海东的殖民地近代性论,是将近代视为世界史上以西欧为中心的“殖民地近代”走向霸权化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他试图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也纳入这个过程之中。借尹氏的话来说,这个研究是要“从殖民地中将西欧近代性对象化”并且加以评价,换言之,是要抉剔作为“应该内在化于殖民地本身之中的外部”的西欧近代,最终目的是扬弃以下两种倾向,一是拜服于西欧近代脚下的一国史近代化论(被称为“新右

姜万吉:《近现代韩日关系研究史》(《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期报告书》日韩文化交流基金网站,2002-2005年)。

徐京植《分断を生きる》(影书房,1997年)。

翼”）、一是民族主义历史学（被称为“掠夺论”）。当然，三者目前仍在激烈论争中，在此特别要指出来的是，这个殖民地近代性论是从“跨越国境的”立场提出来的。可是这一点实际上并不被理解，因此与既有的近代化论混为一谈而遭受批判。例如，尹氏指出：“近代化论为了证明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成长，强调自立的市场所达成的殖民地工业化，并以之作为近代化的指标；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殖民地受到宗主国的强烈控制，经济主体的内部存在着歧视、分割，是个不完全的市场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尹氏认为问题在于：无视于殖民地市场是与歧视性、阶层性世界市场连动而展开的事实，如此一国史的理解导致了这样经济史上，大量的“误读”，而其所部署的帝国、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构造性关联几乎都被抛诸脑后。（附带一提，有别于韩国方面有这样的主张，日本方面如传递这样的内容，无疑就是对殖民地统治不知悔改的反动言论。）另外，在民族主义“掠夺”论方面，他们强烈主张因殖民地时代政治、社会权利的限制而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掠夺，否定自立的市场已然形成。

关于这个问题，殖民地近代性论是以殖民地日常性的掠夺为前提，强调近代性与歧视是同时显现的，在这意义上是在世界体制之中相互关连而形成的共时性现象的一环。尹氏对这一点作如下的说明：

“无论是将近代国民国家、或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将近代化的经济成长设定为近代性的指标，这些全是出自一国史的近代性的解释。因此，两者（引用者按：‘掠夺’论与近代化论这两者）皆无法跳脱近代至上主义。如此一来，两者虽共有近代化的进步这样的历史观，‘掠夺论’回顾过去、‘殖民地近代化论’则不当地追认现在，都沦于过度的诠释。”

“西欧与殖民地，同时呈现了出了曲折多样的近代性，近代已经不是可以与特定地缘政治学上的位置结合思考的主题了。（中略）所有的近代当然都是殖民

《殖民地近代と大衆社会の登場》（宮嶋博史等編《殖民地近代の視座》岩波書店，2004年）。

《历史学研究》867号（2010年）之编辑委员会对于“殖民地近代（性）论”的理解，看起来也是强调「近代性」的议论，完全忽视了 transnational 的面向。

韩国近年的殖民地近代化论以首尔大学校落星堡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为代表，最近介绍到日本的有李榮薰《大韓民国の物語》（文藝春秋，2009年）。须川英德把李荣薰的研究视为与民族主义历史观对决的著作、给予好意的介绍。（書評《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76号，2010年）的确，普遍认为李氏在所谓近代化论者中是实证精密度最高的论者。但是，尹海东对于李氏作为民族主义批判的议论给予一定评价的同时，也强烈批判他经济还原论的倾向、还有最严重的一国主义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韩国近现代史论争？》，《新东亚》569号，2007年，首尔）

地近代。(中略)这不会让殖民地依社会进化论式的文明论发展阶段的规则,而被定位在底层。(中略)这样的认知不是将殖民地当作一国的、自足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单位,而是将其视为帝国的一部份,帝国与殖民地构成着一个相互作用的‘关连的世界’,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略)‘殖民地近代论’同时拥有贯穿帝国与殖民地的共时性、以及联系殖民地与后期殖民地的通时性。另一方面,殖民地也具有掠夺与文明化开发的两面性。总之,殖民地近代的问题意识,是位于近代的两义性与殖民的两义性交错的地点上。”

如引文所述,在此尹氏所强调的是,宗主国的帝国与殖民地的共时性(关连的世界)的问题。尹氏的主张是:暴露在帝国压倒性的优越地位与掠夺之下、遭受歧视的殖民地,绝对不是个别单独的存在,而是正以这两者作为它们近代性、资本主义近代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由此产生,且延续至今天‘后期殖民地’的问题、可以说是应该用跨越国境的观点来思考的。

以上,以尹海东的议论为中心探讨了跨越国境的历史的可能性。但是,对于熟悉近代历史学的人来说,从跨越国境的观点来记述历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近代历史学,是指「史料搜集 选择 观察 注释、记号化、排列、解说」之一连串的作业,亦即根据近代实证主义的方法而建构的国民史=一国史的记述模式。实证主义的方法虽然会被前景化、反题(für sich)化,但后者,也就是“国民史的记述模式”要被反题化却极为困难。毋宁说,民族的、国家的、政治的框架、发展史式的时代区分等,一方面成为史料配置的“基底”=框架变成背景,前者的实证性理所当然的将那些框架“固定在历史资料中”,如此一来几乎将很难被反题化。因此,要进行跨越国境的历史记述,非得同时进行元层(meta-level)框架的重新构建才行。

为了进行这个工作,本文最想强调的是:必须与韩国、中国等东亚地区的人士、研究者积极地累积共同研究。当然,这样的工作已经在各种场面启动,也获

前掲《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

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新曜社,1996年)。

在这里立刻想到的是,作为战后历史学的巨型理论(grand theory)、展现过影响力的诸种马克思主义,当然曾经以这个元层的(meta-level)框架存在过。在与近代实证主义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证性一段时期有将框架的理所当然化逆向操作而主张自己框架的优越性,现在则可说是显示实证主义使元层框架难以追问的一个好例子。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与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完全是不同的问题。慎重起见,补充说明如上。

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但是，如要进一步地向前推进，超越自国史之间的对照、进行跨越国境的视角的转换都是必至的课题。现在韩国人士所强烈要求的正是这样事情。